



【庙堂江湖】

改革了供给侧，才能有创新潮；只有鼓励了创新潮，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的改革。

当供给侧遇到了创新潮

沈凌

最近的财经媒体被“权威人士”刷屏，“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有德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人都来问我，这个“L型”是个什么东东？供给侧改革和全民创新，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不是权威人士，不敢妄议，仅仅就我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加以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恐怕是二战之后最杰出的大国增长范例，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值得自豪的地方。值得自豪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要一下子从穷人变成富人；不值得自豪的地方是，到

目前为止，我们的增长还在半途，不会半途而废，取决于后半程的持续力。

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前半段和后半段还是有一点儿不一样。越是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模仿就越重要。这时候，说直白一点儿，就是我们在努力地复制别人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努力是关键，创新比较少。随着经济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自我创新就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不理解的道理。

重要而且略微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逐步演化，以便

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因为资本积累是关键，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资本获得市场融资（比如政府背书甚至直接拨款补贴等等），如何能够尽快地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政府前三十年做得大致不错。当然这也是成败论英雄。很多人检讨这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代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债务比例很高。是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问题。但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在一穷二白落后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

初，我们即便知道这是增长的后果，恐怕也会义无反顾。

但时至今日，抱残守缺和翻历史旧账一样不可取。伴随着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到来，政府更加需要的是减少繁文缛节，精简机构，减少税收，缩回自己过多的有为之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让民营资本去寻找自己最可能最擅长的创新领域。而这个过程既有对“全民创新”的鼓励，也有改革现有“供给侧”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改革供给侧，是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坚决关停那些僵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开放民间资本进

入，国退民进才是化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压力的必由之路。国家既不能也不可为国有企业再兜底，再注资，以债转股这类貌似创新的金融手段苟延残喘。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应该和国有企业战线收缩，专注于极小范围的特定领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现在的政府实力，还是需要化解的国有企业包袱，和当年朱总理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更小，拥有的资源更大。

改革了供给侧，才能有创新潮；只有鼓励了创新潮，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的改革。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口舌之勇】

华为如果真的要整体外迁，对于深圳财政是坏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却是好事。

从华为外迁传闻看城际竞争

孙勇

这两天，“华为要撤离深圳，搬迁至东莞”的传闻被狠狠炒了一把，起因有三：其一，华为的确已经把自身的部分业务板块迁移至东莞松山湖一带；其二，深圳领跑全国的高房价与高地价，不仅让普通深圳人不满，也让包括华为在内的在深高科技企业倍感压力；其三，一些自媒体出于追求高点点击率和吸粉的需要，以标题党的套路制造噱头。

对此传闻，华为公司23日正式回应称，华为从未有计划将公司总部搬离深圳，传言不属实。华为公司官方网站声明的原文是：“华为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

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声明既出，传闻自可告一段落。

回想这两天，我身边发生的与“华为迁离深圳”传闻有关的两件事，还是觉得有些意思。

第一件事：从我的微信圈看，转发“华为迁离深圳”传闻的主要是深圳人，在转发的同时，他们还不忘加上按语，抨击一下深圳的高房价，希望深圳以此作为改革土地财政。

第二件事：几位深圳龙岗区的中学老师和我聊天谈到“华为迁离深圳”时，颇多忐忑，他们担心华为一走，龙岗失去一个纳税大户，财政收入将大幅下降，这会影响到龙岗区公立学校的教师福利待遇。

管中窥豹，可见担心“华为迁离深圳”的，主要是深圳人。与此相反，东莞

人对此则是欢喜的。公开信息表明，2015年华为已成为东莞市第一纳税大户。

这次传闻所提到的东莞松山湖——据称是华为总部迁入地——4个月前我恰好去过，那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湖畔有一大块地，华为公司科研新大楼赫然在建。把这么好的一块宝地留给华为，土地出让金也不高，表明东莞市诚意十足。摆在眼下寸土寸金的深圳，华为要想摊上这等好事，只怕是连门儿都没有。

此外，为了解决华为驻松山湖员工的后顾之忧，东莞市政府还将本市最好的中小学资源，通过建分校的方式，延伸到松山湖。

被服务到这个份上，华为若对东莞不动心，才是十足的傻瓜。

当然，深圳整体的制度环境、硬件

设施、产业配套、创业氛围、市政管理水平，是目前的东莞难以比肩的。这也是华为总部依旧驻扎深圳，只将部分业务板块与分支机构迁至东莞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狼毕竟是来了。谁也不敢轻易断言，5年或者10年之后，华为与东莞的恋爱，会热烈到什么程度。深圳作为华为的初恋和原配，会一如既往地拴住华为的心吗？从理论上讲，华为总部迁离深圳投奔东莞，并非没有可能。

深圳的产业要升级，东莞的产业要转型。这两个相邻的南方城市，有望上演一场争夺优秀企业的双城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像华为这样充满活力的龙头企业，必将是受益者。因为，竞争会倒逼地方政府改善为企业服务的态度与能力，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克服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把高企的地价与

房价降下来，从而为中国制造的成本减负。同时，在竞争中，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差距也有望缩小。

在深圳与东莞两地政府（加入第三方城市也行）争相拉拢华为的过程中，老谋深算的任正非如果卖卖关子，左右逢源，便宜行事，也是一件让企业家们与有荣焉的好事。毕竟，企业家们才是经济舞台上的主人，他们被政府献殷勤，而不是反过来，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应有的常态。

所以，华为总部如果真的要外迁（这意味着迁入地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深圳），对于深圳财政是坏事，对于中国制造业、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却是好事。这是我期待看到的双城竞争的良性演变趋势。也希望这样的城际竞争能在更多的地方上演。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旧游戏玩儿不下去了，要推出新游戏。这或许就能带来一点儿进步。

丢手绢儿

木木

“丢啊，丢啊，丢手绢儿，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呀，快呀抓住他！”这首歌，想必大家都熟悉，对，就是那个历史悠久、青春永驻的儿童游戏——“丢手绢儿”——的配乐。

但凡上过幼儿园的，大约没人没玩过“丢手绢儿”这个游戏。七八个、十几个小朋友围成一圈儿蹲在地上，一边拍手一边“没完没了”地唱着这首“名歌”，另一个小朋友，手里拿条手绢儿，在圈儿外或紧张、或镇定地绕着走，一边走一边观察——看谁好欺负，就把手绢儿偷偷丢在这位的背后。而蹲成圈儿正唱得起劲儿的，心情也一点儿不轻松，要时刻小心别被人欺负了——一旦发现自己中招，就要马上捡起身后的手绢儿去追那个“坏蛋”。

在“坏蛋”成功“鸠占鹊巢”之前，如果抓住了他，“坏蛋”就能被惩罚，否则，被惩罚的就只能是自己。

多少次的实践证明，留给“倒霉蛋儿”的时间总是很短。

这实在是一个设计得很精妙的游戏，既能锻炼小孩子的观察能力，反应速度，也能锻炼他们的精细动作能力、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奔跑的速度，总之，这个游戏能锻炼四肢力量，强化心肺功能，刺激神经发育，也难怪能常玩不衰。本人上世纪70年代初在幼儿园里就经常被老师带领着参与这个游戏训练，三十多年后，小女在幼儿园也能经常领略这个小游戏的魅力。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要玩好这个游戏，还是很需要领悟一些要点的。比如，如果你是那个“坏蛋”，你就有两种选择，或者找一个“弱者”来欺负，或者找一个“强者”来

挑战。两种选择，两种不同的乐趣。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奔跑能力都不如你的“弱者”，结局就是注定的，再拿来“表演”一遍，游戏就有轻松而略带了戏谑的味道；反之，如果挑战“强者”，结局就有变数，或被人家一把抓住、推倒，或成功抢得他的“宝座”，游戏就多了刺激的吸引。

再比如，如果你是蹲成圈儿被选择的对象，那就更需小心。不但要看——不是那种瞪着俩大眼的傻看，而是察言观色、见微知著地观察——看那个绕了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坏蛋”，还要看“同类”，尤其要观察自己对面的那几个，他们往往能最先发现你的身后出了情况，而且还要听，训练得更出色些的，甚至能够“感知”，这几乎就是一种“第六感”能力了，这样的高手，往往能在手绢儿落在自己身后的一瞬间，就马上做出反应，没准儿还

能把刚刚干了“坏事儿”的“坏蛋”吓一跳呢。

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玩这个游戏，还是挺累人的，不但肌肉紧张、精神、神经也高度紧张。往往小孩子们玩一会儿，就能累得满脸通红，精神、神经兴奋得难以自制。幼儿园三年，这样隔三差五地一路训练下来，最后，小朋友们往往都能成了精。这大约算得上一种自我生存能力的初级训练了吧。那首配乐，大约就是这个游戏的“点睛之笔”，也很好诠释了这种“初级训练”的意义。尤其是那句“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简直有点儿出神入化的味道了。

小孩子玩游戏，成人了，大约“游戏”也无处不在；小孩子玩游戏，输赢无所谓，输赢都有益于其成长；成人了玩“游戏”，有时候真的不能输，因

为实在是输不起。不过，成人的世界里，成了精的真不少，三弄两弄，总能将别人荷包里的“骂你”，揣进自己的怀里。绝大多数的人，往往后知后觉，碰到这种人，除了自认倒霉、躲回家窝在角落里舔舐流血的伤口，似乎也没啥好办法。

我这么说，你也别不信。比如，那个名曰“哥仑步”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其董事长魏庆华质押套现股票之后，立马快速辞职失信失联，就是一个挺好的例子。你大概也不得不感叹，这个魏庆华，“丢手绢儿”的游戏，玩得真好！不过，虽然类似的几乎成了精的高手很多，但总这么玩儿，游戏终究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旧游戏玩儿不下去了，要推出新游戏，总要有点儿不一样的说辞吧。这或许就能带来一点儿进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生娃容易带娃难

马虹玫

前一阵，借国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东风，我写过一篇关于生与不生的专栏。那篇文中未尽之言，想在这里接着讨论。生育适度放在国家层面有了政策指引，是好事，然而生下来的娃儿，交给谁来带？孩子降临后的现实养育问题困扰着想生而不敢生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这深刻影响着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与选择。

农耕社会，生养孩子都是女人的事情。富人家的太太们只需功受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后有个人保姆和奶奶协助完成养育孩子的过程。穷人家没有经济实力去雇佣这样的人，社会化专业团队，通常穷苦人家的女人一辈子就在生孩子带孩子养孩子中循环轮回。

为什么要生孩子？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想清楚答案。传宗接代、生物本能、情感满足、终极性需求、经济回报（赡养行为），这些因素也许都有。生孩子既是一种经济投入，那么养育孩子的成本则不能不计入其中。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曾提出一个观点——“孩子是一种耐用消费品”。话说得生硬难听，却符合经济学规律。孩子生育出来之后的养育与教育，确实需要家长和社会持续不断的多方面投入。

甲女，曾为某500强员工，由于丈夫工作非常忙碌，甲女在怀孕后不得不辞去收入可观的工作而成为专职主妇。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失去20万元可以量化的工资收入，还失去了一些无法量化的个人体验，如她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在职业活动中获

得的经济独立与个人尊严。为了生养孩子，她回归家庭，承担起辛苦养育孩子的责任，从事着烦琐的家务劳动，并失去了光鲜的职业妇女的社会声望。隔壁老太就常感叹，“一个好好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孩子，只能在家里带孩子，多可惜……”

我国的妇婴保障体系，乍一看，保障周全，每一个女职工都可以享受带薪产假以及哺乳时间。试问广大的劳动职业妇女们，有多少人享受到此政策？国家并没有因此项规定向具体的用人单位进行经济补偿。别的不说，就连每月五元钱的独生子女补贴，如今我孩子八岁了，从来没有领过这笔钱。这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育儿成本，转嫁给了企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因为是政府拨款，此项保障倒是极好）。企业支付同样或略少

的报酬雇佣女员工，却因为女性的生育带来的工作效能的降低，让企业“吃亏”，换成您是老板，您还心甘情愿雇佣女性？

伴随着整个社会工资收入的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指引下，很多孩子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了竞争，孕妇服用大牌保健营养品、高档水果、胎教、早教设施设备商品，哪一项都离不开钱。在深圳，生育保险基本上全面覆盖。早几年这是深户才能享受的福利，现在覆盖到了非深户籍，从孕期规定项目的产检到生产的费用，都由生育保险支出。孩子出生后也有少儿保险覆盖。这两项在生育家庭省下不少费用。我国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虽然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议覆盖到学前教育阶段，也只提提就过去

了。深圳市政府灵活变通，从2013年起，为在园幼儿每人每年发放1500元成长补贴，钱看起来不多，但总比没有。犹记发放当年，家长们奔走相告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作为改革开放先试先行的特区深圳，能否步子再快一些，胆子再大一些呢？

在生养孩子这回事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夫妻不会从养老回报这方面去考虑是否生养孩子。在深圳，生育保险基本上全面覆盖。早几年这是深户才能享受的福利，现在覆盖到了非深户籍，从孕期规定项目的产检到生产的费用，都由生育保险支出。孩子出生后也有少儿保险覆盖。这两项在生育家庭省下不少费用。我国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虽然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议覆盖到学前教育阶段，也只提提就过去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思想如虹】

孩子降临后的现实养育问题困扰着想生而不敢生的人群。